

重访数字民主:互联网介入与网络政治参与

——基于列举实验的发现

孟天广 季程远

摘要:进入互联网时代,互联网普及对国家治理带来了革命性影响。学术界对此存在冲突性观点:乐观者认为互联网通过刺激网络行动主义和强化网络社会链接促进政治参与,而悲观者认为互联网导致网民日益区隔,网络去政治化削弱了政治参与。现有解释忽视了互联网介入方式在互联网应用与网络政治参与之间的联系机制。本文利用对中国网民的调查实验从个体层面检验了互联网介入对网络政治参与的影响。列举实验有效削减了政治参与测量的社会意愿偏差,凸显出中国网民比较活跃的政治参与状况。统计分析显示,互联网介入方式是网络政治参与的关键变量,集体性介入显著促进网络政治参与,而个体性介入则有负影响或无影响。简言之,互联网普及并不会自动带来网络民主,只有集体性介入才可通过强化网络社会联系和信息扩散激发网络参与。

关键词:互联网介入; 个体性介入; 集体性介入; 网络政治参与; 列举实验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5CZZ036);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9154030);北京市社会科学联合会青年社科人才资助项目(2015SKL001)

作者简介:孟天广,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助理教授(北京 100084);季程远,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DOI:10.13613/j.cnki.qhdz.002479

一、引言

进入21世纪,中国社会迎来了互联网时代。伴随着整个社会的日益网络化,互联网的普及对转型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带来了革命性影响,前所未有地推动着中国政治文明的发展。一方面,互联网为公民创造了积极参与公共治理的创新途径。互联网的开放性、及时性和匿名性为公民获取政治信息和表达政治观点提供了低风险、低成本的手段,大幅刺激了网络行动主义(internet activism)。由技术产生的开放化效应几乎有无限的潜能,^①互联网使得公民与政府的直接双向互动成为可能,为公民的政治参与提供了新的手段和路径,这为直接民主、协商民主带来了新元素。大量实证研究已经表明,互联网对公民政治参与有显著的促进效应,被称为动员(拓展)效应(expansionary perspective)。^②然而,由于转型期中国网络空间存在的包括网络去政治化、信息虚假化、参与情绪化等现象,又限制着网络政治参与的发展,而政府的互联网监督管理也影响着网民的参与热情。另一方面,互联网通过虚拟链接前所未有地延伸了传统社会的组织和动员方式,进而为虚拟空间的政治参与提供了组织资源。

① 参见郑永年《技术赋权:中国的互联网,国家与社会》邱道隆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4年,第2页。

② 参见Gibson, Rachel K., Wainer Lusoli and Stephen Ward, Online Participation in the UK: Testing a “Contextualised” Model of Internet Effects, *The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05, No. 4.

基于以上理由,现有研究大多乐观地预期互联网普及必然带来所谓的“数字民主”(digital democracy)^①在网络空间推动着广泛的政治参与。^②然而,网络民主的悲观主义者却认为互联网普及不仅无助于网络政治参与的发展,相反,密集的网络化及网络的娱乐化会导致公众退出公共生活,引起政治兴趣和政治参与水平的下降。

尽管上述诸多研究讨论了中国引入互联网对公民参与的影响,然而,很少有研究讨论互联网介入影响网络政治参与的微观机制,其结果就是微观证据不足以支撑宏观观察,而过于粗略的宏观观察又引发出极端性的价值判断以及无休止的争论。本文试图引入互联网介入(internet involvement)这一概念来搭建起互联网时代与网络政治参与二者的机制性联系,用以弥补微观证据与宏观结论之间往往缺失的一环。互联网介入指人们利用互联网的方式和程度,可以区分为个体性介入(individual involvement)和集体性介入(collective involvement),二者对网络政治参与发挥着截然不同的影响。前者指公民以个人化方式介入和使用互联网,后者指公民以集体化方式介入和使用互联网。互联网介入方式的分野实际上构成了网络政治参与的发轫,集体性介入为网民搭建了组织与动员网络、信息交流与分享平台,直接激发网络政治参与,而个体性介入则通过隔离网民和网络利用商业化弱化了网络政治参与。本文利用2014年全国代表性网民数据检验了上述理论,并得到实证支持。

二、文献回顾与理论框架

(一) 文献回顾

互联网的动员效应,指互联网会使较少使用传统政治参与方式的个体卷入政治过程的现象。对于互联网的动员效应,不同的学者有截然不同的解读。就互联网特性来讲,匿名性弱化了个体的前台行为和后台行为之间的区隔,使得后台行为前台化。^③开放性和低成本性使得参与行为变得更加廉价;Farrell强调了互联网带来的交易成本降低,偏好伪装和同质分类(homophilous sorting)的解释机制。^④偏好伪装指的是,在互联网上,人们隐瞒真实偏好的冲动得到缓解,更加乐于表达,甚至极端化。同质分类的机制则指出,志趣相投的个人在互联网上结成小共同体的可能性大为提高。

现有文献对互联网应用与政治参与的关系有四种主流解释。第一,更多的政治参与信息和机会。互联网提供了丰富的信息,便捷的讨论平台,例如博客、微博等提供的信息和带来的讨论等;第二,参与成本的降低。只要接入互联网,人们可以不花费额外成本参与政治,这减少了参与的障碍;同时,线上参与的开放性及其提供的平等的机会提高了这种可能性;第三,互联网的实时性可以提供参与的各种信息,这使得人们可以参与到各类公共活动之中;第四,作为互动性的媒介,互联网可以通过电子政务等形式增强直接民主以及人们与官员之间的互动。^⑤

网络空间存在的抗争行为是互联网政治参与行为的重要方面,对于两者之间的关系,Kelly区分

① 参见 Hague, Barry N. and Brian Loader, *Digital Democracy: Discourse and Decision Making in the Information Age*, New York: Psychology Press, 1999, p. 2。

② 参见孟天广、李锋《网络空间的政治互动:公民诉求与政府回应性——基于全国性网络问政平台的大数据分析》,《清华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

③ 戈夫曼(Erving Goffman)的戏剧理论认为,人生就是一出戏,每个人都是演员,人们为了表演,可能会区分出前台和后台。前台是让观众看到并从中获得特定意义的表演场合,在前台,人们呈现的是能被他人和社会所接受的形象。后台是相对于前台而言的,是为前台表演做准备、掩饰在前台不能表演的东西的场合,人们会把他人和社会不能或难以接受的形象隐匿在后台。在后台,人们可以放松、休息,以补偿在前台区域的紧张。

④ 参见 Farrell, Henry,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Internet for Politic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2012, No. 1。

⑤ 参见 Gibson, Rachel K., Wainerlusoli and Stephen Ward, *Online Participation in the UK: Testing a 'Contextualised' Model of Internet Effects*。

了“作为动员结构”“作为政治机会”以及“作为框架化工具”的互联网。^① 郑永年和吴国光指出,互联网的价值可以理论化为信息渠道、公共领域和集体行动的平台。^② 黄荣贵提出了四种分析模型:工具性模型、心理学模型、社会资本模型和公共领域模型。^③ 虽然他们的研究着眼于网络与抗争行为的关系,但提出的解释机制同样适用于一般性的网络政治参与行为。对于信息的理解是工具性模型和心理学模型争论的焦点,前者将参与的原因诉诸于信息的丰富和获取成本的下降,因而互联网可以带来普遍的政治参与的提高;而心理学模型则认为信息只是一种刺激,对政治参与的作用仍然依赖于个人对于信息的处理。个人的浏览偏好、使用方式都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其次,在社会资本模型中,研究社会资本的学者特别关注互联网的多种使用方式如何有利于维持现有的社会资本,并促进新的社会资本的生成;例如,Miyata和Kobayashi指出,手机邮件有助于维护已有社会资本,电脑邮件有助于发展新的社会资本。^④ 最后,公共领域模型强调互联网有助于促进政治讨论,有助于公共舆论的生成。

上述不同的机制相互作用,使得网民的政治参与行为大量涌现。King等的研究表明,网络上存在的参与行为大致可以区分为批评政府官员或政策(state critique)与讨论集体行动(collective action potential)的行为。^⑤ 后者有向抗争行动转变的可能性,在上世纪末的东德、东欧和最近的中东都最终演变为“颜色革命”。Yang(杨国斌)指出,互联网对于中国公民社会的风险评估中应当注意到互联网带来的新的元素。^⑥ 十年后,似乎证实了与最初的预言,他在最新著作中指出,在许多个案中,集体行动事件首先发生在网络,并且互联网也被用于组织线下集体行动,尤其是环境抗议事件。^⑦

有关互联网使用(internet use)与政治参与的研究中,也通常纳入传统政治参与研究的影响因素变量,例如社会经济地位变量(受教育程度、收入等)、资源变量(时间、金钱等)和心理变量(政治兴趣、政治效能感、价值观等)。一些研究也考虑互联网和传统的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介的比较,例如Tolbert和McNeal、Hardy和Scheufele的研究。^⑧ 对网络政治参与的研究,无疑可以借鉴这些影响因素的设置。

(二) 社会意愿偏差与列举实验

众所周知,社会意愿偏差是社会调查中经常遇到的难题。社会调查通过受访者的自报或自填来获取数据,但受访者往往会倾向于否认社会所拒斥的行为或承认社会所希望的行为;这就使得在调查敏感性问题或涉及社会规范问题时,受访者倾向于隐藏对自己不利的行为,使得调查结果系统性地偏向那些价值“正确的”或者社会提倡的行为或态度,从而造成测量结果高估或低估。这种误差容易导

① 参见 Kelly Garrett, R, *Protest in an Information Society: A Review of Literature on Social Movements and New ICTs*,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006, No. 2。

② 参见 Zheng, Yongnian and Guoguang Wu, *Information Technology, Public Space, and Collective Action in China*,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2005, No. 5。

③ 参见黄荣贵《互联网与抗争行动:理论模型,中国经验及研究进展》,《社会》2010年第2期。

④ 参见 Miyata, Kakuko and Tetsuro Kobayashi,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net Use and Social Capital in Japan*,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008, No. 1。

⑤ 参见 King, Gary, Jennifer Pan and Margaret E. Roberts, *How Censorship in China Allows Government Criticism but Silences Collective Express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013, No. 2; King, Gary, Jennifer Pan and Margaret E. Roberts, *Reverse-Engineering Censorship in China: Randomized Experimentation and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Science*, 2014, No. 6199。

⑥ 参见 Yang, Guobin, *The Internet and Civil Society in China: A Preliminary Assessment*,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003, No. 5。

⑦ 参见杨国斌《连线力:中国网民在行动》,邓燕华译,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5页。

⑧ 参见 Tolbert, Caroline J. and Ramona S. McNeal, *Unraveling the Effects of the Internet o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2003, No. 2; Hardy, Bruce W. and Dietram A. Scheufele, *Examining Differential Gains from Internet Use: Comparing the Moderating Role of Talk and Online Interaction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05, No. 1。

致有偏估计,平滑或者中和变量间的关系和增加测量误差。^①一些重要的政治话题,如政治行为、腐败经历等等是最容易受到社会意愿偏差影响的议题。

为了解决社会意愿偏差对测量工具信度和效度的影响,列举实验法(list experiment)和随机应答法(randomized response technique)应运而生并在社会科学中得到采用。随机应答法最早由 Warner 在 1965 年使用。^②该方法同时给受访者两组题,由受访者通过抛掷硬币来自选择回答哪道题。通过这种方法,采访员和研究者无法知道每个受访者具体回答的题目,可以减少受访者担心个人隐私被暴露的风险。但该方法过于费时,操作复杂,对研究题目和提问方式亦有较多的限制。列举实验法由 Miller 用于测量调查研究中的社会意愿偏差。^③较之于其他减少社会意愿偏差的方法,该方法能够得到与直接测量具有显著差异的结果,衡量直接测量的偏差程度。Kuklinski 等曾利用该方法测量种族歧视,发现美国南方种族歧视依然显著。^④

列举实验法是一种随机实验。这一实验首先将受访者随机分为控制组和实验组。控制组接受一组为 N 个行为条目的测量,不需要从中选择具体哪个条目适合受访者个人情况,而只要求受访者选择适用于自己状况的条目总数。实验组则接受 $N+1$ 个行为条目的测量,相对于控制组,增加了一个研究者关注的关键条目(key item),同样要求受访者报告适用于自己状况的条目总数。这样,如果控制组的平均值为 \bar{X}_1 ,对照组的平均值是 \bar{X}_2 ,那么研究关注的敏感条目的比例即为 $(\bar{X}_2 - \bar{X}_1)$,表示总体人群中有多少比例具有该敏感行为。^⑤列举实验还要求在控制组中对关键条目进行直接提问,这种比较直接提问结果和列举实验结果即可估计社会意愿偏差的程度。列举实验通过要求受访者报告条目总数而非具体条目来降低其在受访过程中所感受到的社会意愿压力(social desirability pressures),^⑥保障个人隐私,从而测量真值。近来,Blair 和 Imai 基于贝叶斯统计学提出了列举实验的多变量分析方法加速了列举实验在激进政治行为、恐怖主义、腐败行为等主题领域的广泛应用,成为实验政治学的前沿领域。^⑦

(三) 研究假设

传播学中的使用和满足理论(uses and gratifications)强调媒介的具体使用方式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介入程度的不同也会带来不同的结果。^⑧前文的分析也指出,信息的处理可能是网络政治参与的关键原因,其中暗含着互联网使用方式差异所带来的影响,同时,这种使用方式的差异也会影响社

① 参见 Zerbe, Wilfred J. and Delroy L. Paulhus, Socially Desirable Responding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 Reconceptation.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87, No. 2; Maccoby, Eleanor E. and Nathan Maccoby, The Interview: A Tool of Social Science, *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 1954, No. 1; Peterson, Robert A. and Roger A. Kerin, The Quality of Self-Report Data: Review and Synthesis, *Review of Marketing*, 1981; Zerbe, Wilfred J. and Delroy L. Paulhus. Socially Desirable Responding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 Reconceptation,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87, No. 2; Cote, Joseph A. and M. Ronald Buckley, Measurement Error and Theory Testing in Consumer Research: An Illustration of the Importance of Construct Validation,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1988, No. 4.

② 参见 Warner, Stanley L. Randomized Response: A Survey Technique for Eliminating Evasive Answer Bia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1965, No. 309.

③ 参见 Miller, Judith Droitcour, *A New Survey Technique for Studying Deviant Behavior*, University Microfilms, 1984.

④ 参见 Kuklinski, James H., Michael D. Cobb and Martin Gilens, Racial Attitudes and the "New South"?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1997, No. 2.

⑤ 参见 Meng, Tianguang, Jennifer Pan and Ping Yang, Conditional Receptivity to Citizen Participation Evidence from a Survey Experiment in China,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2014): 0010414014556212.

⑥ 参见 Holbrook, Allyson L. and Jon A. Krosnick, Social Desirability Bias in Voter Turnout Reports Tests Using the Item Count Techniqu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2010, No. 1.

⑦ 参见 Blair, Graeme and Kosuke Imai,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List Experiments, *Political Analysis*, 2012, No. 1.

⑧ 参见 Finn, Seth, Origins of Media Exposure Linking Personality Traits to TV, Radio, Print, and Film Use, *Communication Research*, 1997, No. 5.

会网络的维护和生成。因而,互联网的使用涉及多样化的目的,不同的目的对于政治参与的影响是非常不同的。一些研究将互联网使用操作化为单一的指数,^①另外一些研究则将目的不同的互联网使用直接纳入考虑,^②还有学者分别考量各种使用目的的不同作用,^③第一类研究可能会受数据影响,显然,仅仅考虑闲暇时间使用互联网的频率的分析并不精细,得到的影响效应噪声很多。第二类研究简单地将不同的互联网使用目的纳入模型并不利于分析的深入,不仅如此,不同行为之间可能存在的共线性将影响模型识别,另外还需要对个体的互联网使用和交互的互联网使用加以区分。第三类研究简单罗列检验每一互联网使用的目的,尚不足以总结为普遍的规律。

本文认为,对于互联网的使用,以使用过程中是否接触他人为标准,可以区分为个体性介入和集体性介入。个体性介入指网民以个人化方式介入和使用互联网,而集体性介入指网民互动式地以集体化方式介入和使用互联网。个体性介入主要是 Web1.0 时代的使用方式,主要是以获取资讯和个人娱乐为目的。这种使用方式具有三大特点:第一,个体性介入实质上强化了网民隔离,不仅难以提升网络空间的人际互动,甚而会削弱现实世界的互动。^④第二,个体性介入较为简单,与政治的关联是单向度的,依赖于用户的主动搜索和信息本身的质量,因而难以直接影响那些缺乏政治兴趣的公民。第三,个体性介入具有利用网络娱乐化或商业化而呈现去政治化的特性,使公民从公共生活中退却,甚至压抑了参与热情。相对于个体性介入,Web2.0 时代的集体性介入则更加复杂,其与政治参与的联系也更强:第一,集体性介入首先搭建了纷繁复杂的网络社群,使得网络社会链接得以空前提升。第二,集体性介入推动了政治信息的网络化传播,信息在讨论中不仅质量大为提高,传播速度也大为加快,甚至讨论过程也构成为互联网动员政治参与的工具。总之,集体性介入与政治参与的关联更为立体化,不仅通过信息共享与传播,而且还通过网络社会链接,共同实现网络政治参与的组织与动员。

基于文献梳理和以上讨论,本研究提出以下两个假设: H_1 : 网民对互联网的集体性介入程度越高,其网络政治参与水平越高; H_2 : 网民对互联网的个体性介入程度越高,其网络政治参与水平越低。

三、调查实验与分析方法

(一) 数据来源

为了检验上文提出的研究假设,我们于 2014 年 5—8 月设计并实施了“互联网与社交媒体调查”,并作为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公共媒体使用行为”调查的一个部分。这项调查采取“GPS 辅助的区域抽样”与分层多阶段相结合的方法^⑤来抽取样本,因而可以有效地解决传统户籍抽样中存在的难以覆盖流动人口、户籍资料不精确、人户分离等问题。这项调查共覆盖 24 个省级单位,70 个县级单位,实抽符合调查资格样本 5 654 个,完成样本 3 747 个,有效完成率为 66%。本文研究只利用此次调查的网民样本 1 953 个,考虑到现有网络政治研究大多基于方便样本或自愿样本,本文基于全国代表性网民样本进行统计推论具有方法论优势。

① 参见陈云松《互联网使用是否扩大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社会》2013 年第 5 期。

② 参见 Bode, Leticia, Facebooking It to the Polls: A Study in Online Social Networking and Political Behavior, *Journal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Politics*, 2012, No. 4; 李亚婷《互联网使用、网络社会交往与网络政治参与——以沿海发达城市网民为例》,《新闻大学》2011 年第 1 期。

③ 参见 Quintelier, Ellen and Sara Vissers, The Effect of Internet Use o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 Analysis of Survey Results for 16-Year-Olds in Belgium, *Social Science Computer Review*, 2008, No. 4。

④ 参见 Putnam, Robert D.,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Democracy*,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2000, pp. 216-218。

⑤ 参见 Landry, Pierre F. and Mingming Shen, Reaching Migrants in Survey Research: The Use of the 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to Reduce Coverage Bias in China, *Political Analysis*, 2005, No. 1。

(二) 列举实验与干预分配

考虑到网络政治行为的敏感性,社会意愿偏差成为本文研究的重要挑战,应用传统调查方法直接询问受访人,会低估其线上政治参与的发生比例,因而本文采取列举实验来测量公民的网络参与行为。具体地说,我们将所有样本随机地分配为三组:控制组、干预一和干预二。随机化分配问卷在办公室完成,研究者分别印制控制组、干预一和干预二共三种问卷,并依据以上顺序依次给问卷编号,再将编号问卷发送到调查执行地,由采访员依次进行采访。第四部分将详细介绍列举实验的设计及发现。

(三) 测量互联网介入

互联网介入(internet involvement)是自变量,本文关心公民介入互联网的方式及其程度。具体而言,本文询问受访人“在过去一周内,您上网做过下列事情吗”,这些事项包括使用微信、搜索引擎、阅读/发送电子邮件、进入视频共享网站、在博客/微博等社交媒体发帖、观看视频、浏览新闻、用地图、购物、接打电话、收发短信、看外国电影、下载音乐、发照片、与朋友分享敏感信息和与亲戚分享敏感信息等。对以上互联网介入事项的主成分分析显示,公民的互联网介入可以分为两大类五小类:个体性介入(娱乐、资讯)和集体性介入(分享、社交和通讯)。本文基于主成分分析预测了以上五类互联网介入方式的因子得分,作为自变量纳入多变量分析。图1呈现了五类互联网介入方式因子得分的分布,可以发现,公民通过娱乐和资讯获取等个体化方式介入互联网的程度较深,而利用互联网进行社交、分享信息和通讯等集体性介入的程度相对较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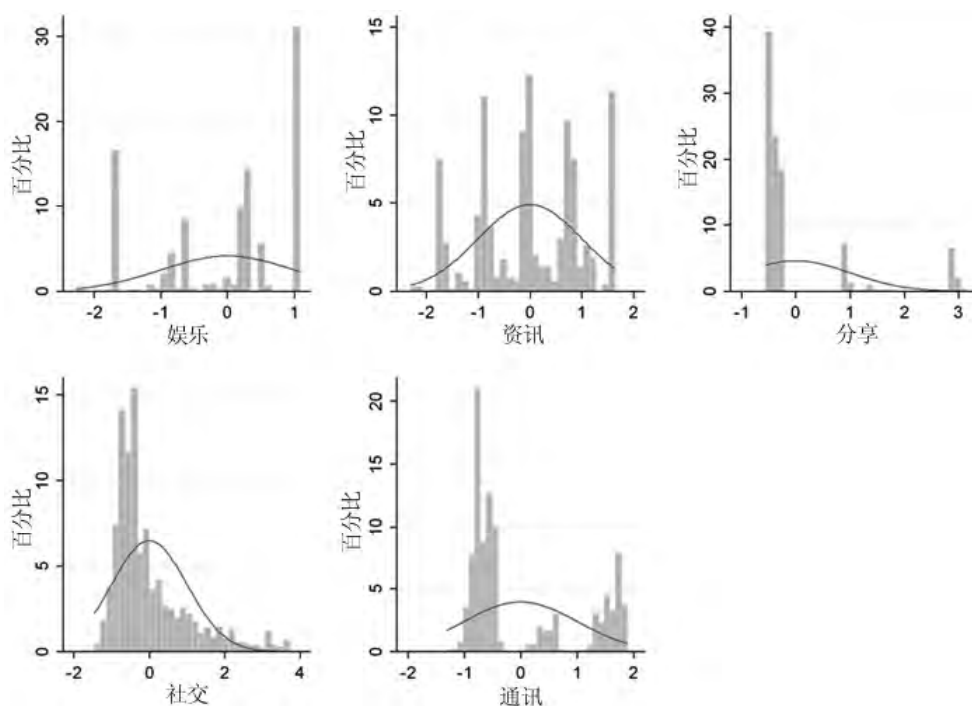


图1 互联网介入方式的分布

除了介入互联网的具体方式,本文还关心公民个体性或集体性介入互联网的程度。个体性介入互联网的程度利用公民使用互联网的年限来代表,集体性介入互联网的程度利用其网友规模来衡量。图2呈现了公民网友数量和网龄的分布,网民的平均网友规模是127人,51%的网民网友规模超过100人,超过200位网友的网民超过28%,甚至有3%的网民有超过500位网友;网民的平均网龄是7.4年,网龄超过10年的网民占到34%,这反映了公民互联网介入程度的日益深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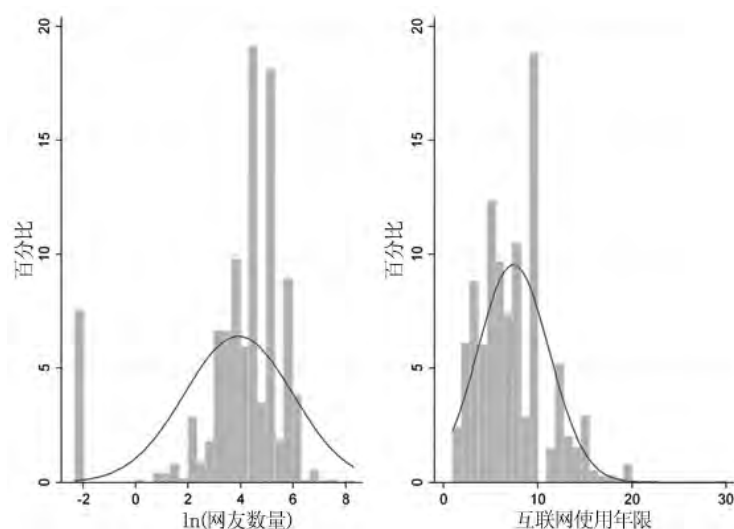


图2 网民数量和网龄的分布

(四) 列举实验的贝叶斯—马尔科夫链—蒙特卡罗 (MCMC) 多变量分析

考虑到政治行为测量中普遍存在的社会意愿偏差问题,本文设计了列举实验来准确地测量网民的网络政治参与。传统上,列举实验的分析采取简单的均值差估计(difference-in-means estimator)来获得总体中某种政治行为或态度发生的比例,然而,均值差估计法难以有效地将人们的背景特征与他们对列举实验的应答联系起来。简言之,研究者无法识别特定政治行为和态度的解释变量。^①

为此,Blair和Imai基于贝叶斯统计学提出了列举实验的多变量分析方法。^②该方法结合贝叶斯统计学,利用马尔科夫链—蒙特卡罗(MCMC)模拟来实施对列举实验的多变量回归分析,进而考察特定自变量对因变量(特定政治行为)的影响关系。为了有效估计研究者提出的假设关系,两阶段非线性最小二乘估计法和最大似然估计法均可以被用于列举实验分析,^③本文分析即系统采用了该方法。利用列举实验的贝叶斯多变量回归分析,不仅可以识别网络政治参与测量中存在的社会意愿偏差效应的规模,也可以分析网民的社会经济背景、互联网介入方式等因素对网络政治参与的影响。简言之,利用该方法在消除社会意愿偏差之不利影响的同时,确保了研究者对因果关系的有效、准确识别。

四、公民网络政治行为:比较直接提问与列举实验

作为一种虚拟空间,网络空间的政治行为主要由一系列线上交互式参与构成,King等基于海量数据分析将中国网民的网络参与分为批评政府官员或政策和讨论集体行动两类。^④本文依据该思路,将公民的网络参与操作化为以上两类,以考察互联网介入方式对两类典型网络政治行为的影响。考虑到以上两种网络政治行为都属于政治敏感问题,直接询问受访人可能会低估其发生比例,因而采取列举实验来测量网民行为。实验设计将所有样本随机地分配为三组:控制组、干预一和干预二,列举实验的设计如下:

①②③ 参见 Blair, G. and Imai, K.,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List Experiments*, *Political Analysis*, 2012, No. 1.

④ 参见 King, Gary, Jennifer Pan and Margaret E. Roberts, *How Censorship in China Allows Government Criticism but Silences Collective Express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013, No. 2; King, Gary, Jennifer Pan and Margaret E. Roberts, *Reverse-Engineering Censorship in China: Randomized Experimentation and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Science*, 2014, No. 6199.

控制组受访人被要求回答在互联网上从事特定活动的数目,问题如下:

您在互联网上做过以下活动吗?您不必说具体哪项,请告诉我0到3之间的一个数字。
a. 玩游戏 b. 购物 c. 看小说 您经历过上面提到的_____件事情。

干预一询问控制组同样的问题,但是增加一个选项“批评政府官员或政策”,问题如下:

您在互联网上做过以下活动吗?您不必说具体哪项,请告诉我0到4之间的一个数字。
a. 玩游戏 b. 购物 c. 批评政府官员或政策 d. 看小说

干预二在控制组选项的基础上增加一个选项“讨论游行/示威/群体性事件”,问题如下:

您在互联网上做过以下活动吗?您不必说具体哪项,请告诉我0到4之间的一个数字。
a. 玩游戏 b. 购物 c. 讨论游行/示威/群体性事件 d. 看小说

为了比较直接提问测量方法和列举实验的差别,估计社会意愿偏差的程度,控制组通过直接提问方法测量了网络政治参与的情况。直接测量法询问受访人是否“在网上批评政府官员或政策”,以及是否“在网上讨论游行/示威/群体性事件”。通过比较直接测量和列举实验结果的差别,可以估计社会意愿偏差的程度从而在因果推论上控制其影响。

表1 列举实验的设计效应检验

取值	控制组		干预一 批评政府官员/政策		干预二 讨论集体行动	
	频数	百分比	频数	百分比	频数	百分比
0	147	23.3	143	22.1	102	15.8
1	189	30.0	165	25.5	165	25.5
2	150	23.8	190	29.3	190	29.4
3	145	23.0	129	19.9	184	28.4
4			21	3.2	6	0.9
样本量	631		648		647	

注: Bonferroni-corrected p-value 分别是 1.057 和 1.000, 表明实验结果不受设计效应的影响。

表1呈现了对列举实验设计效应的检验,结果表明,实验结果不受控制项设计的影响。控制组、干预一和干预二等三组的样本量分别为631位、648位和647位,基本一致。控制组中有23.3%的受访人在互联网上未做过以上列举的三种事情,做过所有三种事情的受访人占到23%;干预一中也有22.1%的受访人未从事过上文列举的四种事情,而从事过所有四种事情的受访人仅为3.2%;干预二中未从事过任何事情的占15.8%,而从事过所有事情的为0.9%。实验目的在于识别网民在互联网上“批评政府官员或政策”和“讨论集体行动”两种敏感行为,列举实验让受访人感受到隐私保护且可以提供准确信息。根据表1,干预一和干预二中选择从事过所有事项的样本比例很低,即实验设计并不存在明显的天花板效应(ceiling effect)。

表2 测量网络政治行为:直接提问 vs 列举实验

网络政治行为	直接提问 (控制组)	列举实验 (实验组)	社会意愿偏差 (social desirability bias)
批评政府官员或政策	0.048 (0.032, 0.065)	0.104 (-0.019, 0.227)	0.056 (-0.068, 0.180)
讨论集体行动	0.051 (0.03, 0.069)	0.268 (0.149, 0.387)	0.217 (0.097, 0.337)

表2报告了网络政治行为的测量结果。当直接提问时,仅分别有4.8%和5.1%的网民在互联网上“批评政府官员或政策”“讨论集体行动”;当采取列举实验时,互联网上有10.4%的网民“批评政府官员或政策”,更有26.8%则“讨论集体行动”。比较两者差异可以衡量社会预期偏差的方向和程度,可以发现,直接询问网络政治参与确实存在着严重的社会预期偏差,会大幅低估网络政治参与行为,“批评政府官员或政策”被低估了5.6%,而“讨论集体行动”更是被低估高达21.7%,前者在90%的置信水平上统计显著,后者在99%的置信水平上统计显著。简言之,采取列举实验降低了社会意愿偏差,可以准确测量网络政治行为。

五、互联网介入与网络政治参与:基于直接提问法

对于互联网介入如何影响网络政治参与这一问题,我们首先基于直接提问获得的网络政治参与数据,利用二元逻辑斯蒂回归分析来考察网络政治参与的影响因素。政治参与的经典理论强调性别、年龄、居住与流动情况等基本人口学特征,教育、收入、就业等社会经济变量,以及党员身份等政治特征,影响政治参与的行为模式。此外,政治价值观、信息获取途径也构成影响人们政治参与水平的因素。本文在分析互联网介入对网络政治参与的影响时将上述变量设为控制变量。

表3呈现了对“批评政府官员或政策”和“讨论集体行动”两种主要网络政治参与进行逻辑斯蒂回归分析的结果。其中模型(1)考察控制变量对网络政治参与的影响,模型(2)分析控制了诸多控制变量后互联网介入对网络政治参与的净影响。总体而言,两组回归模型的拟合情况较好,本文纳入的控制变量解释了8.1%的“批评政府官员或政策”行为和6.7%的“讨论集体行动”,而纳入互联网介入后,两个模型(2)对“批评政府官员或政策”和“讨论集体行动”行为的解释力分别提升了7.5%和9.3%,这充分表明互联网介入的确构成网络政治参与的关键原因之一。

根据表3,网络政治参与受到基本人口学特征、社会经济因素和政治价值观的影响。首先,“批评政府官员或政策”受到城乡居住地、年龄、家庭人均收入、威权价值观等因素的影响,而且上述影响在控制了互联网介入因素后仍然统计显著。与农村居民相比,城市居民更倾向于批评政府官员或政策;年龄越大的网民对政府的批评越少;收入水平与在网上批评过政府正相关;威权价值观限制着网民的参与行为。其次,“讨论集体行动”也受到年龄、家庭人均收入和威权价值观等因素的影响,且其影响方向与“批评政府官员或政策”一致。上述发现表明,网络政治参与显著受到代际更替、经济发展和政治文化的影响。受到技术壁垒和开放度的影响,年轻人是网络政治的主体,年轻人比老年人更熟练地利用互联网参与政治与社会活动,而且他们对技术革新和新兴事物更具开放心态。富裕阶层介入互联网的程度更高,利用互联网获取信息和开展社交活动的频率高于其他人群,这为其线上政治参与提供了不可或缺的信息和组织资源。政治价值观反映了人们对公众与政府之关系的文化构建,对政治行为施加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威权主义价值观强调公众与政治权威间的垂直联系,强调公众对政府的服从与信赖,削弱着政治参与的心理基础。

本文更关注互联网介入方式和程度对网络政治参与的影响。根据表3,纳入互联网介入变量的确提升了假设模型对网络政治参与的解释力,集体性介入对两种主要网络政治参与有显著的提升作用,而个体性介入未能施加显著影响。就网上批评政府而言,网友规模和互联网通讯都显示出正向影响。网民的网友规模越大,其在网上批评政府的可能性就越高。除了利用互联网进行社交、通讯、分享等集体性互联网介入方式都提升了网上批评政府的行为,但分享的回归系数未能统计显著。对于网上讨论集体行动,利用互联网开展通讯和分享信息都显著提升了网民讨论集体行动的发生比,而网友规模也发挥着正向影响,但未能达到统计显著。总之,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集体性介入切实提升了网络政治参与,而个体性介入并未发挥显著影响。

表3 网络政治参与的逻辑斯蒂回归分析

	批评政府官员或政策		讨论集体行动	
	(1) 系数(标准差)	(2) 系数(标准差)	(1) 系数(标准差)	(2) 系数(标准差)
城市(参照:农村)	0.521(0.276)*	0.549(0.282)*	0.298(0.277)	0.307(0.283)
男性(参照:女性)	0.138(0.224)	0.178(0.231)	-0.050(0.232)	0.007(0.241)
年龄	-0.030(0.012)**	-0.025(0.013)*	-0.034(0.013)***	-0.029(0.014)**
教育(参照:小学及以下)				
初中	1.737(1.034)*	1.619(1.041)	1.054(0.753)	0.952(0.764)
高中	1.455(1.043)	1.294(1.052)	0.370(0.778)	0.209(0.793)
大专及以上	1.548(1.052)	1.354(1.063)	0.758(0.784)	0.561(0.803)
流动人口	0.166(0.295)	0.210(0.307)	0.139(0.298)	0.176(0.313)
就业	-0.165(0.252)	-0.146(0.262)	-0.102(0.261)	-0.068(0.273)
党员	0.151(0.333)	0.109(0.348)	-0.019(0.370)	-0.082(0.389)
ln(家庭人均收入)	0.436(0.113)***	0.451(0.118)***	0.435(0.116)***	0.456(0.122)***
威权价值观	-0.450(0.100)***	-0.424(0.108)***	-0.350(0.106)***	-0.331(0.116)***
信息获取	-0.154(0.246)	-0.425(0.273)	-0.032(0.256)	-0.350(0.285)
集体性介入				
ln(网友数量)		0.139(0.080)*		0.068(0.075)
社交		-0.084(0.110)		-0.066(0.113)
通讯		0.643(0.107)***		0.754(0.114)***
分享		0.083(0.103)		0.194(0.100)*
个体性介入				
资讯		-0.170(0.123)		-0.130(0.128)
娱乐		0.182(0.152)		0.211(0.162)
上网年限		0.031(0.031)		0.017(0.033)
常数项	-7.569(1.718)***	-8.091(1.815)***	-6.803(1.605)	-6.954(1.727)***
样本量	1696	1696	1692	1692
Log likelihood	-333.804	-306.433	-317.264	-285.636
Pseudo R ²	0.0811	0.1564	0.0669	0.1599

注:***p<0.01, **p<0.05, *p<0.1。

六、列举实验的多变量分析

考虑到社会意愿偏差在政治行为测量中的重要影响,本文应用列举实验消除社会意愿偏差来准确地测量中国网民的网络政治参与。列举实验呈现出良好的效果,比较准确地测量出网民的真实参与水平。正如上文所述,社会意愿偏差的存在不仅影响研究者对政治现象的认识,还严重影响对因果关系的识别。因此,这部分将利用列举实验来分析互联网介入对网络政治行为的作用。

结合列举实验与贝叶斯方法,我们对列举实验实施了贝叶斯—马尔科夫链—蒙特卡罗多变量分析^①,分析结果参见表4。因变量是列举实验测量的网络政治参与,自变量与表3一致。为方便与表3比较,表4也分别呈现了对“批评政府官员或政策”和“讨论集体行动”两种主要网络政治参与之影响因素的贝叶斯统计分析结果。模型(1)考察控制变量的影响,模型(2)分析控制了诸多变量后互联

① 参见 Blair, G. and Imai, K.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List Experiments, *Political Analysis*, 2012, No. 1。

网介入对网络政治参与的净影响。比较模型(1)和模型(2),可以发现,当引入互联网介入时,“批评政府官员或政策”和“讨论集体行动”两个模型的对数似然值的绝对值大幅度下降,表明模型(2)的解释力有较大提高,即互联网介入的确塑造着网民的参与行为。需要说明的是,表4基于列举实验,其分析结果优于表3。以下分析将主要讨论列举实验的贝叶斯多变量分析结果。

根据表4,网络政治参与受到基本人口学特征、社会经济因素和政治价值观的显著影响。概括起来,一方面,“批评政府官员或政策”受到性别、年龄、流动人口、就业状态、党员、家庭人均收入、威权价值观和信息获取程度等因素的影响。其中,男性、流动人口、就业者比其参照类更多在网上批评政府官员或政策,党员比非党员更少批评政府,年龄、家庭人均收入和信息获取程度与网上批评政府呈负相关关系。另一方面,“讨论集体行动”也受到城乡居住地、性别、教育水平、威权价值观和信息获取程度等因素的影响。其中男性比女性更多讨论集体行动,城市居民比农村居民更少讨论集体行动,教育水平与讨论集体行动正相关,而威权价值观和信息获取程度均负向影响线上讨论集体行动。

表4 基于列举实验的贝叶斯多变量分析结果

	批评政府官员或政策		讨论集体行动	
	(1) 系数(标准差)	(2) 系数(标准差)	(1) 系数(标准差)	(2) 系数(标准差)
城市(农村)	0.371(0.725)	2.464(1.887)	-2.020(1.089)*	-7.898(3.256)***
男性(女性)	0.698(0.706)	7.547(3.600)***	0.687(1.286)	9.514(3.791)***
年龄	-0.088(0.058)	-0.976(0.368)***	0.004(0.052)	-0.027(0.072)
教育水平	0.434(0.362)	0.514(0.715)	1.755(1.063)*	3.938(1.501)***
流动人口	0.146(0.820)	8.457(3.562)***	-0.178(1.243)	-1.329(1.499)
就业	1.344(0.804)	8.088(3.507)***	0.717(1.143)	-2.701(1.859)
党员	-1.482(1.215)	-9.492(4.735)***	0.116(1.575)	2.791(2.334)
ln(家庭人均收入)	0.809(0.397)**	3.825(1.945)**	0.255(0.465)	-1.810(1.113)
威权价值观	-1.072(0.372)***	-4.560(1.831)***	-0.204(0.636)	-1.173(0.662)*
信息获取	-0.711(0.630)	-5.905(2.226)***	-2.934(1.219)***	-9.048(3.487)***
集体性介入				
ln(网友数量)		0.692(0.394)*		-1.183(0.722)
社交		1.482(0.759)*		-1.493(1.012)
通讯		4.886(2.033)***		4.023(1.646)***
分享		1.961(0.964)**		3.294(1.436)**
个体性介入				
资讯		-2.892(1.189)***		-0.839(0.765)
娱乐		-1.599(0.962)*		0.260(0.875)
上网年限		1.817(0.665)***		0.148(0.233)
常数项	-8.387(4.436)*	-33.199(21.192)	-3.974(5.623)	27.311(13.905)**
样本量	1729	1729	1729	1729
Log likelihood	-1410.556	-1294.829	-1416.773	-1293.852

注:***p<0.01, **p<0.05, *p<0.1。

根据表4,互联网介入显著地影响着网络政治参与,其中集体性介入显著地促进了网络政治参与,而个体性介入则对网络政治参与有负向影响。具体来说,网友规模和集体性地使用互联网(如利用互联网从事社交、通讯和信息分享等)都显著地提升了网民在网上批评政府官员或政策的概率,而个体性地利用互联网(如利用互联网获取咨询和娱乐等)显著地降低了网民批评政府的行为,仅有网龄对批评政府行为有正向影响。此外,对于线上讨论集体行动,利用互联网从事通讯和信息分享发挥

着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个体性利用互联网并未发挥显著影响。简言之,在消除了社会意愿偏差的影响后,互联网介入与网络政治参与的联系更为清晰:集体性介入强化网络政治参与,而个体性介入削弱网络政治参与。本文的上述发现不仅对于回答“互联网真的带来了数字民主吗?”有重要价值,而且在理论上进一步阐明了互联网促进数字民主的具体机制。可以说,互联网时代的来临并不会自动带来数字民主或参与民主,数字民主的来临主要依赖于公众的互联网介入方式,只有集体性介入才可以推动网络空间社会联系的强化和信息扩散的加速,为政治参与提供必需的组织和信息资源,激发各类形式的政治参与。

七、讨论与结论

进入 21 世纪,中国迎来了互联网时代,整个社会日益网络化,这给中国的国家治理带来了革命性的影响。根据 2015 年 1 月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伴随着互联网社会的发展,我国网民已经突破 6.49 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 47.9%,手机短信、微信、微博、虚拟社区等互联网应用日益流行。值得注意的是,学术界存在两种看待互联网政治的基本观点:乐观主义者认为互联网普及会刺激网络行动主义、强化网络社会链接,必然带来更广泛的公民参与和数字民主;而悲观主义者则认为,互联网普及不仅无助于公民参与的发展,网络的娱乐化和商业化导致网民日益隔离,从公共生活退却,导致政治兴趣和政治参与的下降。

本文正致力于从理论和经验上系统地回答“互联网能否带来网络民主”这一重大理论问题。与现有研究将互联网使用视为同质性概念不同,本文在理论上区分了集体性介入和个体性介入两种互联网介入方式的差异,以及两种介入方式影响网络参与的不同机制。本文认为,互联网介入方式是塑造网络政治参与的关键机制之一。利用 2014 年实施的一项全国代表性网民调查实验,本文在个体层面检验了互联网介入对网络政治参与的影响。实验发现,传统方法对网络政治参与的测量存在严重的社会意愿偏差,而列举实验有效地削减了社会意愿偏差的影响。中国网民的网络政治参与比较活跃,分别有 10.4% 和 26.8% 的网民“批评政府官员或政策”或“讨论集体行动”。对直接提问法和列举实验的计量分析表明,集体性地使用互联网(利用互联网从事社交、通讯和信息分享等)提升了网民批评政府或讨论集体行动的行为,而个体性地利用互联网(利用互联网获取咨询和娱乐等)则降低了网民批评政府行为,但对讨论集体行动没有影响。

总之,互联网影响网络政治参与的微观基础存在于网民的行为逻辑之中,本文的研究在个体层面验证了互联网介入方式在塑造网络政治参与中的关键作用。只有对互联网的集体性介入才会凸显互联网强化信息扩散和社会链接的效应,激发网络政治参与,而个体性介入并未实质性扩展网民的社会链接,反而会增强网民间的隔离,或者利用网络的娱乐化和商业化替代网民对公共事务的兴趣。可以说,互联网普及并不会自动带来网络民主,网络参与的来临取决于公众的互联网介入方式,只有集体性介入才可以推动网络空间社会联系的强化和信息扩散的加速,为政治参与提供必需的组织和信息资源,激发网络政治参与。

(责任编辑:匡云)

ABSTRACTS

An Argumentation on 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he Idea of Imperial Despotic Society from the Qin Dynasty to the Qing Dynasty

Li Zhenhong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 of the mind-dictating policy from the Qin to the Qing imperial period is setting one definition (Ding Yu Yi) , which seeks the absolute ideological unity of the entire population. After unifying China , the way the Qin Emperor chose to govern the country was to control people's minds and unify their ideas. Learning from the Qin failure to control people's minds through burning books and burying Confucian scholars , Emperor Wu of the Han Dynasty implemented the intellectual policy of banning one hundred schools of thought and exalting the six classics of Confucianism. This policy established the intellectual order of setting Confucianism as the state ideology , and using the guiding role of policies so that people knew what to follow and then leading people to accept the state ideology. It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achieving the true unity of thinking and ideological dogmatism.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after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further promoted the universal access to Confucianism and finally turned the goal of ideological unity into reality. Since the first emperor' of the Qin Dynasty , the Chinese emperors had compulsively transformed the ideal pursuit of thinkers in the pre-Qin period from the idea that *the sage will be king* into that *the king is sage*. They linked the arbitrary power with the sage mind , made the intellectual fraud of the son of Heaven(emperor) being sage , induced the subjects to take the emperor's thinking as their own thinking and surrendered their own power of independent thinking. The practice of taking officials as teachers , which had been executed since the Qin period , is taking emperors as teachers in essence. This system is designed to carry through the idea that the son of Heaven is sage to the end that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people in the whole world are controlled by one autocrat. What prompts the emperors to set the fraud of the son of Heaven is sage and to unfurl the banner of taking officials as teachers is despotism. As for the people who have slept for thousand years in the fraud , they cannot be woken up because they have lost their power and ability to think. Intellectual despotism is the despotism on thinking. Therefore , the target of imperial despotism is thinkers. In more than two-thousand-year imperial period , few people with thinking had emerged , due to the suffocating atmosphere of the unity of thinking. Anyone with a little bit thinking ability either chose to be vigilant at every moment and keep consistent with the imperial authority , or to confess piously and surrender to the imperial power after raining against the stone wall , in the hope of preserving their lives. In the intellectual ocean devoid of intellectual personality , there are no waves and ripples. Whereas it is this vast and deathly still ocean that prevents the giant ship of imperial despotism from sinking. In comparison with Marx criticism of the inspection system of Prussian books and newspapers , what is executed in Chinese history is typical intellectual despotism. Thus , it is appropriate to depart from the facts of such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and determine the over two-thousand-year imperial period from the Qin Dynasty to the Qing Dynasty as imperial despotic society.

The Era of Digital Democracy? Internet Involvement and Onlin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Evidence from a List Experiment

Meng Tianguang , Ji Chengyuan

Since the coming of the Internet Era , the popularization of internet has brought about a revolutionary impact on national governance. There are competing views on the role of internet in governance among scholars: the optimists believe that internet has strengthened th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by stimulating internet activism and constructing the network of social links , while pessimists hold that internet weakened th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through growing segment of internet users and depoliticization of internet. Previous studies usually underestimate the roles of internet involvement to link internet use and online participation theoretically. Based on a survey ex-

periment to Chinese internet users , we examine the effect of internet involvement in online participation on the individual level. The list experiment displays the effective capacity to reduce social desirability bias of measuring online participation. As a result , Chinese citizens are relatively active online. Econometric analysis shows that internet involvement is the key variable to activate online participation. Collective involvement significantly promotes online participation while individual involvement shows negative or no influence. In sum , the popularization of internet will not automatically bring digital democracy , collective involvement , rather than individual involvement , will stimulate online participation by strengthening the network of social links and the diffusion of online information.

Internet Agenda-Setting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 Research Based on an Experimental Survey

Guo Fenglin , Yan Jie

Internet brings changes to both the agenda-setting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public. Using an experimental survey data , the effect difference o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by different internet agendas can be reached. Overall , the discussion on agenda still limits mostly on itself , indicating a rather not-so-strong trend of politicization. Among the agendas , the international ones easily stimulat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 or mainly through the interactive way of discussion. While for the social type , it is mainly correlated with socialized participation , or mainly through the attention to attributes on social disputes and government control. The browse of agenda information would stimulate the un-institutional participation. The mode for political agendas is more complex , whose trigger point is more widely distributed. The internet era sees a more diversified relationship between agenda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 where the agenda type , issue attributes and the way of discussion all matter in intertwined ways , which demands more to governance.

The Involvement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in the Global Climate Change Negotiation: Evidence from a Survey Experiment in Beijing

Su Yusong , Meng Tianguang

With China's increasingly active participation in global governance , it has become a top priority to optimize the institutional building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which safeguards national interests and enhances public suppor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nfluence of the involvement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in the global climate change negotiation and examines the public evaluation of such involvement. The experimental study shows that Beijing citizens value positively on the role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in the global climate change negotiation; but most citizens are more inclined to authorize just the government delegates to participate in the negotiation. Although citizens think positively about social organization participation in the negotiation , they do not think it would matter much if social organizations do not participate. In short , the government should recruit appropriate and more motivated social organizations into global governance , and actively expose information of the involvement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to the public. Moreover , the government should also construct the mutual trust relationship among the government institutions , social organizations , and the public to lay an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 for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From Althusser to Xia Zhongyi: A Symptomatic Reading of Xia Zhongyi's *On Zhu Guangqian's Aesthetics*

Liu Fengji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ymptomatic reading , the paper , based on an analysis of *On Zhu Guangqian Aesthetics* by Xia Zhongyi , discusse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Xia Zhongyi and Althusser in the fact: what the former has established is a three-tier reading approach including the collection of symptoms , the proposal of a new problématique , and the recognition of human value; whereas what the latter has established is a two-tier reading approach consisting of the collection of symptoms and the proposal of a new problématique. Emphasizing human